

第二國際重要人物略傳

(世界历史資料)

历史教研室选印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目 录

威廉·李卜克内西	1
奥古斯特·倍倍尔	4
保罗·拉法格	10
弗兰茨·梅林	16
罗莎·卢森堡	18
卡尔·李卜克内西	23
普列汉诺夫	29
卡尔·考茨基	48
爱德华·伯恩斯坦	54
茹尔·盖德	58
讓·饶勒斯	60
爱弥儿·王德威尔得	63

威廉·李卜克内西

威廉·李卜克内西（一八二六——一九〇〇年）——德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和领袖之一。他积极参加过德国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革命失败后，他最初侨居瑞士，以后在伦敦。侨居伦敦期间，李卜克内西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一八六二年，由于大赦，李卜克内西得到了返回普鲁士的机会；在普鲁士，他以各种德国和外国民主派杂志的通讯者的名义进行工作。李卜克内西是第一国际革命思想的最热心的宣传者之一，是第一国际在德国的分部的组织者。一八六五年，李卜克内西再度被迫离开普鲁士而迁居萨克森（莱比锡）。在那里，他加入了奥·倍倍尔组织的萨克森工人协会，而从一八六八年起又做了其机关刊物“民主周刊”（*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的编辑。李卜克内西给予倍倍尔以强烈的影响。

列宁写道：“倍倍尔善于在李卜克内西那里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同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伟大言论的亲身接触；同当时即已建立，虽然不大，却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活生生的代表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亲身接触”（“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二六五页）。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坚持不懈地跟拉萨尔派的德国工人总同盟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普鲁士容克国家的行径进行了斗争。反对拉萨尔同俾斯麦——他在普鲁士容克领导下达到了统一——妥协调和的政策时，李卜克内西这样评价了俾斯麦所建立的普鲁士德国：“战场上的产物、国家变革、战争和上层革命的婴儿，它将从一个国家变革跳躍到另一个国家变革，从一次战争跳躍到另

一次战争，它或者在战场上死亡，或者由于下层革命的结果而被消灭。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一八七二年从三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莱比锡陪审法庭上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的叛国案的审判”，柏林，一九一一年，第四五九页）。李卜克内西力图在民主的基础上走向国家的统一，当时犯了严重的错误：在反对普鲁士王朝的斗争中联合了南部德意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联邦主义者和德国民族统一的其他敌人。一八六八年，在工人协会纽伦堡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派彻底破裂了。一八六九年，在爱森拉赫建立了以第一国际革命原则为指南的社会民主工党。

一八六七到一八七〇年，李卜克内西是北德议会议员，而从一八七四年起（有过中断），是德国议会议员。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李卜克内西善于利用议会讲坛以揭露普鲁士容克的反动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一八七〇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时期，李卜克内西同倍倍尔一道出来反对容克和资产阶级的掠夺计划；基本上采取了正确的国际主义立场，表现了同巴黎公社的团结一致。因为反对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一八七二年，李卜克内西同倍倍尔一起被俾斯麦政府控以“叛国”罪而受审。翌年判决囚禁。由于在王朝法庭的讲坛上以被告身份而向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发出的英勇无畏的言论，恩格斯于一八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兹就你们在法庭前的表现，向你们大家表示祝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七页）。

为达到德国无产阶级的统一，李卜克内西在一八七五年促成了爱森拉赫派与拉萨尔派的联合。但是，李卜克内西在这里犯了严重的错误：在革命理论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向拉萨尔派作了很大的让步。社会民主党哥达统一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该纲

領的主要作者是拉薩爾)，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方面的極嚴厲的批評。恩格斯寫信給伯拉克說：“我們完全重視你的意見：李卜克內西用自己熱情的願望來達到統一，竟不顧一切代價，他毀壞了全部事業”（同上，第三九七頁）。社會民主黨創立以後，李卜克內西是該黨中央機關刊物“前進報”的主編。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導了李卜克內西的活動，批評了他對機會主義分子的調和主義，這種態度在八十到九十年代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的影響下，李卜克內西在鬥爭的決定關頭，始終採取了革命的立場。取締社會主義者特別法令有效期間（一八七八——一九〇〇年），李卜克內西是非法的黨的戰鬥的實際的領導者之一。李卜克內西不止一次地因革命活動而遭受監禁。李卜克內西屬於第二國際的組織者之列，他是第二國際代表大會的參加者，他積極地反對了軍國主義。

李卜克內西是下列著述的作者：“法國革命史”（一八八七——一八九〇年）“反對軍國主義和反對新的賦稅”（一八九三年）、“社會民主黨人是怎樣的人以及他們要求些什麼？”（一八九四年）等等。

威廉·李卜克內西的著作

“法國革命史”，德累斯頓，一八八七——一八九〇年。

“反對軍國主義和反對新的賦稅”，柏林，一八九三年（和奧·倍倍爾合著）。

“社會民主黨人是怎樣的人以及他們要求些什麼？”，開姆尼茲，一八九四年著（德文原著）。

奥古斯特·倍倍尔

奥古斯特·倍倍尔（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創始者与杰出活动家之一。出生于科隆城（在萊茵河畔）一家貧穷的普魯士下級軍官家里，童年时代是在极端困苦的生活中度过的。十四岁在国民学校畢業以后，就跟一个施工当学徒。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在长期反动統治以后开始活躍起来；倍倍尔就从那时候起参加了社会生活。他出席萊比錫的工人集会，加入資產階級自由主义者組織的工人启蒙团体，并在里面从事积极的活動。倍倍尔受到当时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以及他与威廉·李卜克內西的亲密友誼的影响，終于成了馬克思主义的热烈拥护者。

一八六七年，倍倍尔当选为工会委员会主席；同年，并被选为北德意志联盟議会的議員。倍倍尔乃是議會中的第一个工人代表。他曾經为工人階級摆脱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联合它們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事业而斗争。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遵循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把工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与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部分区别开来，其結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在自由主义的废墟上誕生了”（斯大林：“德国工人領袖奥古斯特·倍倍尔”，載“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一九三頁）。一八六九年在爱森拉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曾經針对着向普魯士国家制度、俾斯麦政策和民族主义所作的各种讓步进行了頑强的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反对拉薩尔派的斗争中，捍卫了“自下而上”統一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

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时期，倍倍尔和李卜克內

西一道坚持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場。拿破崙第三帝国崩潰后，倍倍尔由于在議會中投票反对軍事拨款案而被逮捕。但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倍倍尔又被工人們选入了全德意志議會。倍倍尔对兼并亚尔薩斯和洛林提出抗議，并且在議會中出面捍卫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因此被控以叛国罪。他在大胆揭露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反人民政策以后，于一八七二年被判处两年徒刑，并且褫夺了他的議員資格；后来，又以“侮辱皇帝”的罪名加处了九个月监禁。倍倍尔前前后后一共过了将近六年的監獄生活，他利用这些時間鑽研馬克思主义，广泛地閱讀文学作品和党的著作。特別值得提起的是，他曾在監獄里写成了“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一八七九年），这本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仅在德国国内就印行了五十几版。

在一八七五年有倍倍尔参加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代表大会上，爱森拉赫派与拉薩尔派实行合并。两派合并所依据的哥达綱領，乃是机会主义的、拉薩尔派的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給予哥达綱領以无情的批判，說它在任何时候都是絕對“不利于党而且会破坏党的。

一八七八年，俾斯麦經由德国議會通过了反社会主义者特殊条例。这一条例的实施，使許多社会民主党人感到张皇失措。許多社会民主党人上了挑拨的当而热中于无政府主义，而另一些人則墮落成自由主义者。倍倍尔起初站在取消派的立場，主张解散党；但是不久以后，他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进行了两条战綫的斗争：既反对那些否认必須利用合法可能性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学会了把合法工作与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艰苦年代中，“倍倍尔表现为党的真正的領袖。他及时地看到了危險，懂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的正确，而善于把党引

上不調和的斗争的道路”（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载“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二六七页）。

在一八九〇年废除了反社会主义者特殊条例以后的年代中，曾經有許多新的党员加入了党的队伍，他們之中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以福尔马尔为首的公开机会主义者以及假装“左倾”模样而实质上滚入了无政府主义泥坑的“青年派”，就是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言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經受了和七十年代反社会主义者特殊条例頒布以后所經受的同样的党的危机。列宁后来指出，“如果说这次党的危机历时并不太长也并不太严重，那末，这正应该大大归功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因为他們給了两面摇摆的态度以最坚决的打击”（同上）。倍倍尔同时把党主要引向于議會活动，并且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逝世（一八九五年）以后，伯恩施坦出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当时，倍倍尔曾对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但是，这一斗争却不曾具有彻底的、原則性的、战斗的性质。倍倍尔沒有提出开除伯恩施坦及其拥护者出党的問題，却在与修正主义者的爭論中表現了溫和与柔順，从而在理論上和实际上都对机会主义作了原則上的讓步。这样，倍倍尔就逐漸滾到中派主义，即隐蔽的机会主义的立場上去了。倍倍尔立場的动摇以及他的脱离马克思主义，在对待帝国主义的进攻上特別明显地表現了出来；而当时的帝国主义正是处在資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已形成急剧尖銳化的条件下。还在党的希累斯劳代表大会（一八九五年）上，倍倍尔就和福尔马尔一道坚持了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綱領。在关于国家的評價上，倍倍尔也对机会主义作了讓步，而列宁在这一点上已有所指示（参看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七——六八页）。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倍倍尔在社会民主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一九〇五年）上宣布了作

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武器的群众罢工的必要性。但是一年以后，在曼海姆代表大会（一九〇六年）上，倍倍尔实际上又使耶拿代表大会的決議化为烏有。倍倍尔引用“工会的重要性不下于党”的論調，贊成工会“保持中立”的原則，从而使党的行动路綫去适合工会中机会主义領袖們的觀點和策略。

倍倍尔在其他許多綱領和策略的問題上，也犯了中派主义的錯誤。他虽然一方面正确地认为那些投票贊成政府預算而嗣后又奴顏婢膝地参加了对威廉第二表示忠誠的示威游行的巴登議會中的社会民主党議員的行为，乃是只有“民族自由派”才做得出来的丑态，但是另一方面却拒絕對那些破坏党紀的罪首采取組織上的措施。同样地，他虽然反对与资产阶级的政党結成选举联盟，但是却又在一九一一年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主张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候选人。倍倍尔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提出“各国在殖民地享有平等权利”这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在摩洛哥問題上替德国帝国主义辯护。

倍倍尔的政治錯誤以及他之脱离馬克思主义，还表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取的立場上。他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一九〇四年）上虽然激烈反对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建議，但是在他所坚持的決議中却不置一辞地規避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問題。有倍倍尔参加的这次代表大会曾經通过了认为各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政党应当实行合并的決議。但是这一決議的目的乃在于反对第二国际中的左派，而首先是反对布尔什維克，因此實質上乃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攻击行动；因为決議中並沒有首先強調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合并，只有在无条件承认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維克才不承认代表大会的这一決議。在布尔什維克对孟什維克

的斗争中，倍倍尔在有关党的资格问题上以及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和民族自决权问题上，都无条件地支持孟什维克。

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一九〇七年）上，倍倍尔教条主义地复述马克思针对其他历史时代所发表的意见，并把它搬进了就战争问题所作的机会主义的决议；这个决议曾经受到列宁的猛烈的批评。倍倍尔提出所谓战争应当区别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这一原理，以之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学说。他无视对帝国主义时期的具体历史情况作确切的阶级分析，而主张运用资产阶级的外交手腕。倍倍尔错误地把怙恶德国可能对沙皇俄国发动的战争硬说成无论如何是“求解放的”战争。同时还号召社会民主党在这次战争中要“捍卫祖国”；这实际上就是在支持德国的帝国主义者。

在倍倍尔的政治活动中，即使到了他的晚年，也毕竟有许多良好的表现。倍倍尔曾不止一次地在议会的讲坛上揭发德国军国主义者的罪行，特别是他们对中国义和团起义和非洲赫勒罗人民起义所实行的残酷镇压；并且在许多场合抨击怙恶德国的殖民政策，以及始终不懈地利用讨论预算的机会揭露政府政策的阶级实质等等。

倍倍尔虽然犯了中派主义的错误，但是直到他逝世为止，他都是保持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忠诚的。在这一点上，倍倍尔与他后来的那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物有天渊之别；他们公开地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有意地走上了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领袖列宁与斯大林，一方面既指出了倍倍尔的错误，一方面又承认他对世界工人运动的功绩，特别是他从事活动的初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领导下所建立的功绩。

“工人阶级培养和集聚力量的时期在各个国家内形成了全世界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中的一个必要的阶段。而任何人也没有象奥古斯特·倍倍尔这样突出地在自己身上体现了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载“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二六八页）。

倍倍尔的著作

译成俄文的有：“我的生平”，莫斯科，一九二五年；“妇女与社会主义”，莫斯科，一九二六年。

保羅·拉法格

保羅·拉法格（一八四二——一九一一年）是國際工人運動著名的活動家，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家，法國工人黨的奠基人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親密朋友和學生。正如列寧所指出，拉法格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最有才能的和最深刻的傳播者之一。

拉法格誕生古巴島聖雅哥省的一個法國葡萄牙商人家里。一八五一年，家庭遷回法國。在這裡，拉法格受到了中等教育。此後，進入巴黎的醫學院。拉法格還在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蒲魯東和實証主義者孔德的思想影響下時，就參加了國際工人運動。在反對第二帝國底制度的政治發動中，拉法格同一大批學生一起，於一八六五年年底被開除出學院。一八六六年初，拉法格到達倫敦，做了第一國際底會員，並很快就加入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就在這時，拉法格同馬克思認識了。在馬克思強有力的思想影響下，以及由於研究國際無產階級鬥爭經驗的結果，拉法格逐漸擺脫了虛偽的蒲魯東主義和實証主義的觀點。一八六八年，拉法格在英國結束了自己的醫學的教育。在同年回到法國以後，拉法格就參加了同蒲魯東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堅決鬥爭。拉法格認定：思想上粉碎這些小資產階級學說，乃是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團結法國無產階級的必要階段。在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時期，拉法格正在法國南部，在波爾多。他揭露了“國防”政府底背叛行為，並贊成用革命方法進行戰爭而鬥爭；巴黎公社時期，拉法格領導了波爾多無產階級保衛公社的鬥爭。巴黎公社以後，拉法格僑居西班牙。在這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在同巴枯寧主義者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中，拉法格堅決地捍衛了第一國際的綱領的、策略的和組織的原則。一八七三年，

恩格斯和拉法格接受海牙會議底委托，發行小冊子來反對巴枯寧主義（“社會民主派和國際工人協會的聯盟”）。七十年代，拉法格住在倫敦，他積極地參加了發展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和組織工人黨的工作。一八八〇年，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協助下，拉法格和蓋德擬定了該黨的綱領。同年，拉法格成了“平等報”的合作者。該報刊載了拉法格底論文“階級鬥爭”、“工人政党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革命”等等。拉法格用這些論文為系統地在法國宣傳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基礎。一八八〇年的敕令以後，拉法格回到了法國，並同蓋德一起，領導了工人黨。拉法格展開了反對蒲魯東主義者、可能派分子和其他機會主義流派的鬥爭。與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同時，拉法格為法國無產階級指出了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而革命地奪取政權的方針。拉法格捍衛了無產階級鬥爭底獨立的政治路線，摒棄了同資產階級的合作，並為爭取作為富有戰鬥力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的集中制而鬥爭。

還在七十年代，拉法格就同俄國革命運動建立了聯繫，並在俄國進步的機關刊物上發表論文。拉法格慶賀一八八三年第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團體即“勞動解放”社的誕生。一八八九年，拉法格根據普列漢諾夫的要求，為俄文的論文集“社會民主主義者”寫了一篇論文“議會主義和布朗基主義”。在這裏面，他暴露了資產階級議會主義底階級實質，揭穿了它的資產階級專政的隱蔽形式。稍後，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間進行鬥爭的時期中，拉法格並不隱藏自己對於布爾什維克在解決一系列的原則問題上的同情。

在八十年代，拉法格進行了巨大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寫下了若干著作，其目的是要反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陣營對馬克思的批評。他同時也發表了許多杰出的政論文章：“懶惰的權利”（一八八〇年）、“被出賣的口味”（一八八四年）、“天堂里的庇護九

世”（一八九〇年）及其他等等。在这些論文中，他給予資本主義奴役制度、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其中包括作為資本主義維護者的宗教）以殲滅性的批判。一八九一年，儘管法國反动派瘋狂鎮壓，第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拉法格仍然被選為議會議員。他在恩格斯的直接領導下，光輝地利用了自己議員的權力來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頭十年中，當機會主義以日益增長的力量吞沒了第二國際各政黨時，拉法格曾經是那些反對在哲學上或在政策中修正科學共產主義原理的人們之一。

一八九四年，拉法格出來反對了若列斯調和馬克思與柏拉圖學派唯心主義的企圖（“在歷史解釋中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一八九五年）。拉法格也同樣堅決地斥責了伯恩斯坦“綜合”馬克思與康德主義的圖謀。

在其基本哲學著作“卡爾·馬克思底經濟決定論”（一九〇九年）中，拉法格力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來闡明意識現象的產生和發展，特別是倫理、哲學和宗教思想的產生。在著作“認識問題”中，拉法格詳盡而機智地批駁了不可知論。拉法格進行了反對一切形式的唯心論哲學的堅決鬥爭，認為它是資產階級手中的思想武器。他斥責並揭露了“調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各種企圖。但是，拉法格的哲學著作並不是沒有重要的缺點。拉法格沒有能充分理解並重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靈魂的唯物主義的辯證法，而且時常從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淪到形而上學的機械的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去。

在政治方面，拉法格終生不渝地進行了反對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販賣思想的鬥爭，並摒棄了把議會合法鬥爭絕對化的機會主義思想。拉法格同樣批評了蓋德的改良主義錯誤和民族主義錯誤，這些錯誤在一九一四年會把他引導到背叛工人階級的地

步。

然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拉法格跟机会主义的斗争——尽管他有革命的热情——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拉法格不善于识别考茨基主义，而在若干问题上，自己也滚到了中派主义立场。在形式的统一之名义下，拉法格继续跟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和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们处在同一个党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若干最重要的问题上，拉法格采取了教条主义的和不正确的立场。拉法格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仅仅在于夺取政权，并使政权适应于似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就已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拉法格在农民问题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应当实现同整个农民阶级，而不是同劳动农民的联盟。拉法格不善于了解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时的实质，以及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新的战略和策略的必要性。拉法格活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产生的时候，然而，他却未能了解和领悟它的全世界的历史的意义。

拉法格企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阐明美学和文艺批评底根本问题，他尖锐地批判了把文学和艺术同产生它们的经济基础割裂开来的做法。他说明了文学和艺术对于基础的反作用。拉法格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动理论的始终不懈的敌人和批判者。拉法格激烈反对形式主义的作家，他们很少关心去作正确的观察，以及正确地描绘观察到的东西；他也反对自然主义者，这些人，按照拉法格的断定，仅仅看到了生活的表面，而没有能力去认识现象的本质，觉察到社会发展的法则。但是，拉法格的美学观也没有排除掉机械论的某些袭击。在个别著作中，拉法格对过去的文学遗产的看法带有虚无主义的因素。

引起巨大兴趣的，就是拉法格的語言学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为指导，他企图洞悉語言的奥妙，揭发它的发展的規律性，正如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中所指出的，拉法格承认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必要性。拉法格用思維发展的水平来解释語言的丰富性和发展高度；而思維的发展水平又为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联系的丰富程度和多样性所决定。在拉法格那里，正确的語言学論断是和非馬克思主义的命題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命題就是：在革命进程中，語言的根本破坏和更新；語言发展中的爆发性。在揭示拉法格关于語言发展中的突然的爆发性这一見解的深刻錯誤时，斯大林指出，“拉法格所說在法国‘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間突然发生的語言革命’的話（参看拉法格所著“語言和革命”一文），是不正确的。那时在法国沒有过什么語言革命，更談不上什么突然”（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五——二六頁）。

拉法格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无神論者，在他的著作中，他揭穿了宗教的反动本質。拉法格把克服宗教的世界观同消灭資本主义制度、消灭人剝削人的現象、消灭群众的貧困和文化落后联系起来。拉法格特別无情地揭露了梵蒂岡、天主教教会，它們是工人运动最有害的敌人、世界反动势力的支柱。拉法格令人信服地証明了梵蒂岡跟資本主义社会最反动的势力的联盟。在保卫馬克思主义道德观时，拉法格根据大量的事实材料，証明在阶级社会中道德的阶级性。他无情地批判了假仁假义的和敌視人类的资产阶级道德，同时也証明了革命无产阶级的道德的高尚性質。

拉法格的著作

“拉法格全集”，第一——三卷，莫斯科—列宁格勒，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年。

“政論集”，莫斯科—列宁格勒，一九三一年。